

冲突理论的衍变、特征及在我国教育研究中的本土化应用

郭凯亮

三峡大学, 湖北宜昌, 443000;

摘要: 本文梳理了冲突理论的一些衍变历程、核心特征及其在我国教育研究中的本土化应用。冲突理论源于古典社会学传统, 经马克思、韦伯、齐美尔等学者的奠基, 在批判功能主义范式过程中逐步完善, 强调社会冲突的常态性与动力作用。理论发展呈现多元分化, 如达伦多夫的“权威结构异化论”和戈夫曼的微观互动分析。冲突理论的特征在于揭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与冲突的积极功能, 但也存在对冲突认知的局限性。在我国教育研究中, 冲突理论被用于分析教育资源分配、权力结构矛盾等问题, 并通过本土化实践(如“和谐导向”的冲突转化、制度调适与多元共治)推动教育治理创新, 体现了理论与中国特色教育现实的结合。

关键词: 冲突理论; 本土化应用; 安全阀机制

DOI: 10. 64216/3080-1516. 25. 02. 083

1 冲突理论的衍生

冲突理论作为社会学分析的重要范式, 其衍生过程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认知深化。该理论体系的形成并非线性演进, 而是通过对古典社会学传统的批判性继承与时代命题的回应逐步确立, 其学理基础可追溯至古典社会学传统、多元分层理论和形式社会学, 并在二十世纪中叶对功能主义理论范式的批判中完成理论整合。

早在古典社会学中就存在冲突理论的基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的唯物史观, 为冲突理论提供了本体论基础。其核心命题“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 揭示了物质生产领域的内在张力如何外化为社会对抗。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剩余价值剥削导致的阶级对立必然性: 生产资料私有制使资产阶级通过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实现价值榨取,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生产剩余价值的占有构成冲突的物质基础^[2]。这种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不可调和性, 最终通过暴力革命完成社会形态更替, 形成“阶级斗争是历史直接动力”的经典论断^[3]。

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则突破了经济决定论框架。在《经济与社会》中, 他提出社会分层的三维模型——经济(财富)、政治(权力)、文化(声望)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共同构成冲突基础^[4]。韦伯对权威合法性的分析具有开创性意义: 当法理型权威因社会流动停滞或特权固化丧失认受性时, 被统治者对支配结构的反抗成为必然。这为冲突理论提供了制度分析视角, 其科层制悖论(理性化催生新压制)成为达伦多夫权威冲突论的前导。

齐美尔形式社会学中的有机功能理论更多聚焦冲突的功能维度。他肯定了冲突是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 永远存在, 不会消亡, 也谈不到对社会的有利与否。只要有人群, 就会有种种社会差异, 也就会有社会冲突^[5]。

而冲突的烈度与团体凝聚力、个体情感卷入程度、群体目标清晰度存在相关关系, 合理的调节冲突可以发挥的正向功能包括在温和的冲突中释放敌意和产生更大的安排^[6]。

在对功能主义范式的理论反拨中, 冲突理论逐渐得到完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二战后成为主导范式, 其AGIL模型(适应-目标达成-整合-维模)将社会冲突视为系统失序的非常态。这种均衡假设遭到冲突理论的系统性解构。

首先在认识论层面, 功能主义对“价值共识”的预设遭遇现实证伪。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反战示威等大规模社会冲突, 暴露了功能主义对权力不平等的遮蔽^[7]。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揭露政治、经济、军事精英的小集团^[8], 证实所谓社会共识实为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建构。达伦多夫认为在社会组织中, 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结合是屈从于权威——服从的压制性力量, 冲突起源于一部分人对权威地位、有限资源和声望的缺乏, 被统治者会强烈要求重新分配权威权力或稀缺资源^[9]。

其次在功能维度, 科塞实现理论反转。他认为冲突对社会以及群体具有内部整合功能和稳定功能, 对新群体与社会的形成具有促进功能, 对新规范和制度的建立具有激发功能, 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中重要的平衡机制^[10]。他基于此提出“安全阀制度”来提供转移敌对情感的替代物和发泄侵略性倾向的替代物^[11]。标志着冲突认知从病理现象到结构功能的范式转变。

冲突理论的衍生本质是社会认知的范式重构, 其革命性体现在三重维度: 在本体论层面, 完成从社会均衡幻象到冲突常态论的认知转向。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达伦多夫剖析的权威结构异化、科塞论证的冲突正功能, 共同证明冲突是社会系统的内在属性

而非异常状态。在方法论上,实现制度分析对阶级分析的辩证补充。韦伯的合法性危机理论为理解冲突的疏导路径提供了超越革命叙事的分析工具。最终在功能维度,确立冲突作为系统更新机制的认知范式。齐美尔的安全阀理论经科塞发展后,证明冲突既能释放张力维持系统稳态,又能激发创新推动结构进化。

这种认知转型为教育研究提供了关键分析框架。当审视教育资源分配矛盾时,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揭示结构不平等根源;当解析师生权威博弈时,达伦多夫的制度化调节理论提供疏导路径;当处理校园群体对抗时,科塞的安全阀机制成为情绪管理范式。在冲突理论透镜下,教育场域的冲突不再是系统失效的证明,而是制度创新的催化剂——这恰是理论衍生的终极启示:认识冲突本质,方能在社会变革中驾驭冲突能量,将其转化为文明进步的永恒动力。

2 冲突理论的嬗变

冲突理论在完成对功能主义的批判性重构后,其发展路径呈现出多元化和实践导向的嬗变。这一过程既包含对古典命题的深化,也涵盖对当代社会新矛盾的回应,既继承了传统理论的观点,也在时代变化中得到新的阐释。在对新问题的回答中,冲突理论展现出了强大的延展性与广泛的实用性,能够有效解释从宏观到微观上的诸多问题,也在使用过程中与其他理论不断结合,得到进一步深化。

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1959)中提出“权威结构异化论”,将冲突根源从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转向“权威分配不均”。他认为,任何社会组织都是“强制性协调组合”(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Associations),其内部因权威(命令权)与服从(被支配权)的分化必然产生对立^[12]。例如企业中的劳资冲突是管理者通过制度化的权威支配生产流程,而工人因缺乏决策权形成结构性压抑,这种“权威剥夺”比阶级剥削更具普适性;在冲突调节的制度化路径上,达伦多夫主张通过“法治国家”构建权威再分配机制,如建立劳资协商委员会、完善劳动仲裁制度,将冲突纳入法治轨道。该理论突破了阶级二元对立,揭示组织层级的冲突普遍性,为制度分析提供新框架。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中,将冲突放在个体的层面上,他认为社会冲突的本质是角色期待与自我呈现的断裂。个体通过“前台表演”维持社会秩序,而“后台失控”(如服务行业中的情绪崩溃)则暴露权力不对等引发的隐性冲突。

3 冲突理论的特征

冲突理论的产生是当时社会的需要,对当时社会中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解释,对后来的事物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其中仍有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冲突理论较好的回答了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将冲突理论对社会问题的解释理解为矛盾论对社会现象的另一种学术性表达,其中的学术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契合,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来源在于冲突,与“矛盾是发展动力的来源”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尽管相对于否定之否定规律而言,该理论并没有说明事物发展的趋势是螺旋式上升,没有指明向上向好的发展前景。但是作为分析社会结构的理论框架,它将社会变迁视为利益对抗的结果,为研究改革动力和制度变革路径提供理论支持。让人们能够看到,一些社会制度看似中立,实则偏向强势群体的利益;一些被视为“自然”的现象,其实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其提供的批判性视角,为弱势群体争取权利、组织抗争、推动社会改革提供思想依据。例如工人运动、民权运动、女性主义浪潮,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冲突理论的分析框架。

冲突理论对动力类问题的解释可能存在不完全不充分之处。例如大学课堂上学生为什么不学习的问题,经过调查后我们可以发现,大学课堂上,除了极少部分能够认真学的以外,大部分的学生更多处于一种我知道老师讲的内容是有意义的,我知道我在课上应该认真听,我知道在课上应该尊重教师,我也知道我认真学对我的未来发展有帮助。但是我仍然不愿意学习,不愿意认真听课。其中的根源就在于听课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不听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并且我玩手机、睡会儿觉可以获得当下的快乐。可见我们并不能够将这一现象简单归之为师生之间权力冲突或者是利益冲突,因为教师和学生课堂上都非常清楚自身做什么是对的,怎么做更好,可见大学课堂上学生不学的问题并不是师生之间权力或者是利益冲突的显化。似乎可能将其视为学生当下行为与未来发展之间的冲突,但是明显的是这是学生的自我选择问题,当学生选择不听课就意味着他认为我不听在未来也可以以其他方式解决发展问题,或者不选择追求更高的发展而是得过且过。可见有时问题的产生并不是由于冲突,而可能是因为没有冲突,或者说是冲突并没有得到突出,而冲突理论并没有对这样的情况做一个很好的解释。

对于如何认识冲突有一定的狭隘。冲突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更多是作为一个批判性的视角就此角度而言,该理论对冲突的理解是贬义大于褒义,尽管齐美尔与科塞认识到冲突的存在内部整合和新群体的催生等功能,但是在方法论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例如科塞的“安全阀制度”仅仅是主张调节冲突,让冲突更温和,让敌

意得到释放。似乎对待冲突更像是一种“和稀泥”式的处理法则,看似是发挥冲突的正向功能,实则还是主张弱化冲突。因此在方法论上仍然需要对冲突有着更为完善的认识,因为冲突并不是无序发展的,而是有方向的;我们对待冲突也不应该是被动的,等着新的社会结构产生,我们再去发现冲突和调整冲突。我们去对待冲突应当是主动的,在我们知道未来发展的总体方向的情况下去制造有利于发展的冲突,弱化不利于发展的冲突,而任由冲突的无序发展只会让事物偏离应有的发展方向。如我们社会发展的最终形态是共产主义,我们都应当向这一目标而奋斗;也如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一样,若对教育中问题的处理仅仅是考虑弱化当下矛盾,甚至只要产生矛盾就只想着去弱化矛盾,那么所培养的人未必会是社会需要的,则教育的发展也会走上歧路。

4 冲突理论在我国教育研究中的本土化应用

冲突理论作为社会学的重要分支,为我国教育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我国教育领域存在的诸多矛盾与冲突,既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反映,也是教育制度变革的动力。冲突理论本土化应用是紧密结合我国的教育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冲突分析框架和解决路径的过程。

4.1 教育冲突的本土化表征与理论适配

教育成层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配置不均均是结构性冲突的集中体现。例如,职业院校与普通高校的资源分配差距,不仅反映了教育资源投入的差异,更揭示了不同教育类型在社会认同和制度保障上的深层矛盾^[13]。科塞的“安全阀”理论指出,社会需要提供替代性机制以释放紧张情绪。在我国教育实践中,这意味着需建立制度化的冲突疏导机制。达伦多夫的权力冲突论强调,冲突源于权威结构的不平等分配。这在我国表现为学校治理中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张力,以及家校之间的权力博弈。

4.2 本土化应用的反思与理论创新

我国教育冲突治理的本土化实践,不仅验证了西方冲突理论的适用性,也为其注入了中国特色的内涵。第一,强调“和谐”导向的冲突转化。我国冲突治理的深层逻辑并非一味压制或消除冲突,而是更注重冲突的转化与利用,使其成为推动制度完善、促进关系和谐的动力。这体现了“和而不同”的传统智慧,即在承认差异和矛盾的前提下,追求动态的、积极的和谐。北京朝阳

区的家校矛盾调处、绍兴的“枫桥经验”进校园,都体现了通过制度化渠道将冲突能量引导至建设性轨道的努力。第二、注重结构性矛盾的制度调适。相较于仅聚焦微观人际层面的调解,我国实践更关注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调整。无论是资源分配向弱势地区和群体的倾斜还是学校内部权力结构的优化,都试图从根源上减少冲突产生的土壤。这体现了对冲突理论中关于资源与权力分配不公是冲突根源这一判断的深化应用。第三,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我国的实践突出了综合治理,强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联动、社会参与。这超越了单一学校或教育系统的范畴,形成了多方协同的治理网络,与冲突理论中关于冲突需要在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中寻求解决的观点相契合,并赋予了其中国特色的实践形态。

参考文献

- [1]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60.
- [2] 张传开, 冯万勇. 探索、建构、确立和深化——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历史发展[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45(04): 397-404.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50.
- [4] [美] 乔纳森·H. 新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邱泽奇, 张茂元,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130.
- [5] 王彦斌. 科塞与达伦多夫的冲突论社会学思想比较研究[J]. 思想战线, 1996, (02): 1-7.
- [6] 徐萍. 齐美尔的冲突命题与和谐劳动关系建构[J]. 学海, 2016, (06): 86-89.
- [7] 张卫. 当代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的形成及发展[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7, (05): 117-121.
- [8] 赖特·米尔斯. 权力精英. 李子雯译.
- [9] 徐昕. 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浅析[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40(S3): 68-70.
- [10] 张卫. 当代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的形成及发展[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7, (05): 117-121.
- [11] 科塞. 社会冲突理论[M]. 孙立平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138.
- [12] (美) 达伦多夫著. 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M].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59.
- [13] 林金怡, 许心蕊. 职业本科院校发展的应然特征及战略规划重点——基于教育成层的冲突理论视角[J]. 职业技术教育, 2024, 45(08): 18-21.